

山东大学百年学术集粹

史学卷 上

本书编委会 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山东大学百年学术集粹

史学卷（上）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山东大学百年学术集粹 / 《山东大学百年学术集粹》
编委会编. — 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1. 9
ISBN 7-5607-2346-2

I. 山...

II. 山...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7514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 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济南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218.375 印张 20 插页 5674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定价 (全 10 册): 380.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发行部负责调换

《山东大学百年学术集粹》

总 编 辑 委 员 会

主 任 朱正昌 展 涛

执行主编 徐显明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守元 王育济 朱正昌

刘玉安 李 红 肖金明

宋云峰 赵景华 徐显明

展 涛 傅永军 傅有德

谭好哲 樊丽明

山东大学百年学术集粹·史学卷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王育济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海广	王文泉	王育济
		王晓毅	吕伟俊	朱玉湘
		刘天路	关绍纪	陈尚胜
		徐鸿修	栾丰实	黄冕堂
		路遥		

总 序

徐显明

一所有着百年历史的名校，真正让人倾慕与醉心的并不是它的岁月跬步，而是它历经沧桑开拓奋进所形成的大学精神和独特的治学风范。山东大学的精神与风范，简而言之，就是以学术立校，以育人为本，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并举，有着浓重的人文情怀。“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一直是山东大学所追求的理想办学境界。《文史哲》这种人文杂志最早出现在山东大学和山大有“文史见长”的美誉就是最好的例证。

诞生于齐鲁大地的山东大学，被泽儒风墨雨，吟传稷下齐学余韵，又为汉代经学（郑玄）、魏晋玄学（王弼）、龙学（《文心雕龙》）、农学（《齐民要术》）等灿烂遗产所熏染，具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悠久的学术渊源。20世纪前期的中国形成了一种国学（人文学术）独盛的格局。此一时期的山东出现了一批引人瞩目的国学大师、文化名家，如傅斯年、赵太侔、季羨林、邓广铭、臧克家、牟宗三、任继愈、屈万里等，显示出地域的人文优势。山东大学“文史见长”的特点就锻铸于这一背景下。30年代前期，美丽的青岛海滨，名校名人，风云际会，杨振生、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老舍、闻宥、游国恩、王统照、洪深等学界闻人都在这里执掌教鞭；1949年前后，陆侃如、冯沅君、华岗、成仿吾、赵纪

彬、丁山、杨向奎、高亨、萧涤非、高兰、童书业、王仲荦、赵俪生、殷焕先、殷孟伦、张维华、郑鹤生、陈同燮、薛暮桥、孙治方、吴大琨等学界名家宿学相继聚集山大杏坛，尽职纬帙。这些学界大师，治学目标远大、积淀深厚、著述等身，铸就了山东大学文科的学术传统。这种优良传统犹如一湾清溪将山大的过去与未来沟通起来，使山大学术风范世代相传。继起的山大学子将接受它的浸泡洗礼，像他们的前辈先贤那样，“焚膏继晷领风骚”。

学术传统是一所大学所拥有的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它比起那些有形的资产更加珍贵。山大人文学术传统，内涵丰厚，特色鲜明，概略言之：

一曰养涵崇高，襟怀宏伟，有大家风范。山东大学的前辈先贤们身体力行，视学术犹如生命，具有对学问的虔诚敬畏和不懈追求。“其事必为吾之所极乐为，能尽用吾之所长……而所以为此者，则由一己坚持之志愿，百折不挠之热诚毅力，纵牺牲极巨，阻难至多，仍必为之无懈。”“为真理而追求真理”，宽容而又大气，无门户之见；心贯白日，通权达变，不强服人而人自服，无庸标榜而下自成蹊；孜孜不倦，为后人留下经纬百家、洞烛幽微、历久弥新的传世之作。

二曰开拓创新，研故出新，有敢为天下先的学术追求。风起于青萍之末，秋知于叶落之微。山东大学的前辈先贤都堪称为学问的拓荒者，他们的头脑虽专为学问而准备，但其中却有着对时代变迁，学术兴替的足够敏感。“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以这种自觉，这些学者大师们在学问诸领域辛勤拓荒，酌古御今，出版发表了一大批在各个学术领域处于学科前沿的精品力作。高文典册，体大思精，茹古涵今，起例发凡，一度引领学界思想与学术的潮流。山大文科声被学林，有今日之雄势，不能不归功于前辈先贤的这种学术努力。

三曰沉潜学问，厚积薄发的学术精品意识。受齐鲁文化朴实古风的熏陶，山大的学者承传先贤那种“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精神，懂得做学问要耐得住寂寞这个朴素的道理，他们沉潜学问，厚积薄发，避免浮躁浅薄、急功近利。“根本固者，华实必茂；源流深者，光澜必章”，是他们追求的学问境界。所以，他们留下的华彩篇章才能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精品力作，为后学所景仰。这种传统亦为山大后学所欣然接受，并成为标示山东大学文科研究特色的一个重要方面。

四曰崇争尚辩，追求学术自由的治学精神。山大的前辈先贤推重深邃思辨和学者间真诚坦率的论辩。“知出乎争”这一儒教遗训一直被他们奉为发展学术的重要理念。在他们这里，“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义，共三光而永光”。正因为山大的前辈先贤有着浓郁的为求真知而论辩的治学精神，我们才有了真学术，山东大学文史重镇之地位才得以确立。后学诸子秉承这一精神与传统，才得以将山大的人文优势承传创变，推向未来。

我们的前辈先贤是上述学术传统的创造者和诠释者。他们创造了这种学术传统并用自己的学术创造诠释了这种学术传统的至上价值，而山东大学文科发展中两个辉煌的时期（20世纪30年代和50年代）则是对他们恪守山东大学文科学术传统的最好回报。所有山东大学的后辈学子都是山东大学文科学术传统的受惠者和传承者。这些后辈学子因为秉受传统而受惠无限。一批青年学者脱颖而出，一批学术新秀走向各自学科的前沿，延续着山东大学文科的辉煌。

值此百年校庆之际，我们组织编纂了这套《山东大学百年学术集粹》，一个主要目的就是，通过追寻山东大学文科发展留在历史上的印记，唤起我们对山东大学精神及学术传统的回忆和弘扬。希望所有后学，铭记这一精神与传统，以思索和知晓怎样才能捍

卫学术研究和大学人文传统，并努力奋进，面向新世纪，争创新业绩。

本《集粹》所收录论著时间跨越近一个世纪，内容涵括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管理学、外国语等诸多学科，全书共8卷10册。由于历史久远、时间急促、选择尺度和主持者的局限等原因，本《集粹》可能将许多精品力作遗漏，而收录其中的亦未必都属精粹。对此，我们深感无奈和遗憾。另外，出于对作品历史原貌的尊重，本《集粹》在体例也未作统一要求，体例不统一问题在所难免，这会给读者带来阅读上的不便，对此敬希读者惠予鉴谅，多多指正。

前 言

——我们的学术年轮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有着悠久的百年学术人文传统。1901年山东大学创立之初，即开设历史课程，从此便开始了山东大学“历史学科”的历史。伴随着世纪的风雨，这一学科已经成长为百岁年轮的参天大木，苍劲地挺立在“以文史见长”的山东大学的学术之林中。

—

1901年10月，清王朝的“官立山东大学堂”在济南正式创建。由于“经史”一向是中国学人的传统学问，所以在当时这所旧时代色彩还很浓厚的官办大学堂中，“史学”这门课程受到了特别的重视，是“经学”之外的一门最主要的课程。“官立山东大学堂”的首任校长唐绍仪和1926年再建于济南的“省立山东大学”首任校长王寿彭，都有较深的文史功底。其中王寿彭系清光绪癸卯（1903年）科状元，不但对中国史有研究，对日本史的研究，也有一定的造诣，曾著有《王氏家乘》和《（日本）考察录》等论作。他所选聘的“古史学”（中国史）教授，有清末翰林陈舸庭、举人丛禾生等，“世界史”的课程则大都由留学归国的学者担任。从王寿彭参与制定和执行的《山东大学校大纲》可以看出，学校“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及地方需要为宗旨”，这对“省立山东大学”的学术发展无疑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指令在青岛筹建“国立山东大学”。历

史学家傅斯年为其筹委会的 11 名委员之一。至 30 年代，在“名流云集，阵容堂堂”的（青岛）山东大学中，历史学家丁山、考古学家陈梦家、《墨子》研究专家栾调甫等，都是非常著名的学者。1930 年至 1938 年，在（青岛）山东大学文史学科中任教授的学者先后有 13 人。其中开设中国通史课程的教授有丁山、施畸（天侔）、胡鸣盛（文玉），而以讲师身份开设中国通史的有黄淬伯、彭啸威（仲泽）、吴廷璆等。丁山先生在教授中国通史时，极力提倡“独立钻研之精神”，要求学生在读旧史书时，先不要看或尽量少看古人的注释，以免为旧说所囿。1935 年，他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中刊发的三万余字的长文《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是 30 年代山东大学历史学科的标志性的成果。该文“初稿于（民国）廿三年，十二月增订于青岛山大”，丁山先生附于文末的这句小注，使我们亲切地触摸到了山大历史学科早期成长的年轮。

栾调甫是一名自学成才的墨子学研究专家。20 年代初，他在《东方杂志》发表《谈梁任公墨经校释》、《梁任公五行说之商榷》，引起梁启超的注意，被称为海内墨学研究第一人。1925 年被聘为齐鲁大学教授。1936 年 10 月至 1937 年 8 月，他在（青岛）山东大学任教授，主讲经学史。

三四十年代济南齐鲁大学（教会大学，后并入山东大学）历史学科的发展，主要是由历史学家张维华、墨学专家栾调甫、考古学家吴金鼎等著名学者带动的。1937 年抗战爆发后，齐鲁大学国学所迁至成都。1939 年，国学大师顾颉刚出任国学所所长。齐鲁大学属于教会大学，有较为稳定和充裕的经费来源，这就为其延聘人才提供了条件。当时的史学家钱穆、吕思勉、张维华、王树民，古文字与考古学家胡厚宣等均为齐大国学所延聘，一时名流云集。这些学者中，后来只有张维华先生长期在山东大学工作，他在齐大任教期间（1939 年至齐大，1948 年任文学院院长兼历史

系主任)完成的《明清之际西人东来和西学东渐史》等文,为后来的山东大学中外关系史研究这一强势学科奠定了基础。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在山东临沂抗日根据地创办的山东大学,也曾专设历史教学组,由史学家刘力行教授任组长,开设了中国历史和中国近现代史等课程。著名历史学家尚钺1947年曾在此任教授(尚钺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主任)。

这一时期,青岛山东大学在经历了抗战复校之后,学术上有了新的发展,在文史学科15名教授级的导师中,担任经史导师的为杨向奎、丁山、王仲荦,担任诸子导师的为赵纪彬,担任文学史导师的为陆侃如、冯沅君等。杨向奎先生在此前后刊发了《西汉经学与政治》、《尧典研究》、《李冰治水考》等力作;王仲荦先生的《北周六典》、《北周地理志》等名著的初稿,也是在这一时期得以充实的。他们当时都是国内具有学术影响力的学者。

在三四十年代培养的学生中,后来也有不少成为知名的历史学家。如文物考古学家杨伯达(后曾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中国近代史专家唐棣华(后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思想史专家王先进(后长期在曲阜师范学院任教,晚年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秦汉史专家韩连琪(后在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多年)等。一代代人才的成长,为我们的学术年轮留下了明晰的标记。

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于50年代初进行了全国性的高校院系调整。山东大学、华东大学(由原临沂山东大学与华中建设大学合并为华东大学)和齐鲁大学的史学专家汇集在一起,组建成了新的山东大学历史系,再加上童书业、黄云眉等著名学者的调入,使山东大学历史系成为国内综合性大学同类系中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系科之一。当时,杨向奎、童书业、黄云眉、张维华、

郑鹤声、王仲荦、赵俪生、陈同燮等著名的“八大教授”^①以及赵纪彬、吴大琨、黄绍湘、许思园、华山、卢振华、韩连琪、刘敦愿、孙思白、陈云章、徐绪典等一大批知名学者，均在此任教，群星璀璨，云锦漫天，学术阵容盛极一时。

1951年，在时任历史系主任的杨向奎先生的倡议和华岗校长的支持下，文科部分教授创办了后来被誉为“学报之王”的《文史哲》，由华岗校长任社长，杨向奎先生任主编。以《文史哲》为基地，文史两系师生陆续组织和发起了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的讨论，这在促进和繁荣学术的发展、提升山东大学文史研究的学术地位等方面，产生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时，我校文、史两系师生通过《文史哲》而“引发”或“激化”于学术界的重大学术话题有四——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问题、中国农民战争问题和关于《红楼梦》的讨论。四分天下，“史”占其三；而有关《红楼梦》的讨论，又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明清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等历史问题紧密相关。“把《红楼梦》解读成一首封建社会的挽歌”、“把《红楼梦》还原为社会史事实”之所以成为当时《文史哲》讨论《红楼梦》的主流话语^②，这一“话语权”之所以由山东大学的两名“小人物”率先掌握，显然是与山东大学当时的史学研究，尤其是社会形态史研究的极度活跃有关。

五六十年代是山东大学历史学科发展的一个公认的辉煌时期。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和成就，就是以杨向奎先生为代表的一批知名学者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从而迸发出强大的学术活力，使山东大学的史学研究达到了

① “八大教授”中，杨向奎为二级教授。其余七人为三级教授。“八大教授”之外的吴大琨、许思园、陈云章分别为三、四、五级教授。另一种说法是，“八大教授”中有吴大琨，杨向奎先生因级别较高，不在此列。参见黄冕堂《山东大学历史系50年代教师状况》，载《长风》2001年第2期。

② 参见徐显明《〈文史哲〉与山东大学文科建设》，载《文史哲》2001年第3期。

一个前所未有的学术高度。

杨向奎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师从于史学大师顾颉刚、傅斯年。30年代，他就因与顾颉刚先生合著《三皇考》而知名于史学界。1936年至日本留学期间，他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据童书业先生回忆，“当抗日战争爆发稍前，杨向奎从日本留学回来，他告诉我日本史学界和中国留学界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热烈，使我很受感动，把我埋在脑海深处的陈独秀经济史观的影响引发了出来，我开始想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了”^①。可见，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指导历史研究，正是杨、童等老一辈学者的某种自觉的选择。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山东大学校长华岗的倡导和推动下，山大校园内出现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1951年在《文史哲》的创刊号上，杨向奎先生发表了《学习〈实践论〉——一个史学工作者的体会》，这是一篇自觉接受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的典范之作。在他的影响和带动下，“他周围的一些老先生转变了学术思想，使山东大学历史系和《文史哲》成为当时最活跃的学术园地之一”^②。童书业先生、黄云眉先生、张维华先生、郑鹤声先生、王仲荦先生、陈同燮先生、赵俪生先生等在三四十年代已经知名的学者，此时都开始自觉地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用唯物史观来指导自己的学术研究，在开创新中国的新史学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著名史学家戴逸先生在总结新中国史学的成就时曾指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取得了在历史学领域的指导地位。解放前老一辈史学家中已有人致力于用马列主义指导研究历史，但只是少数人。解

① 参见徐鸿修《求实创新，博大精深——杨向奎先生治学的开拓进取精神》，载《文史哲》2001年第2期。

② 参见徐鸿修《求实创新，博大精深——杨向奎先生治学的开拓进取精神》，载《文史哲》2001年第2期。

放后全国学马列，史学界普遍接受马列主义，自觉地运用马列主义，历史科学面貌焕然一新，发生了飞跃。是否用马列主义指导研究历史，效果很不一样。当然，不用马列指导，史学家也能作出贡献，有的甚至作出高水平的贡献，老一代的如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等，现在在港台或外国的史学家，有的也是很有造诣、很有成绩的。但是，如果运用马列主义指导，那么在历史观上，在研究的目的、选题、方法上，就有很大区别，就会在史学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就。马列主义是科学的锐利的思想武器，运用这一武器来研究历史，使历史学成为一门科学，能用来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给人以智慧和力量。在研究中就能更准确地抓住历史本质，不被现象迷惑，使自己的头脑更清楚，更有分析判断能力……马列主义给新中国历史科学带来了强大生命力。”^①从戴逸先生的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更深刻地体会到 50 年代之初山大历史系的前辈学者自觉地较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用唯物史观指导学术研究的意义之所在。这一点，对今天我们历史文化学院的学术发展仍然是十分重要的。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50 年代的前辈学者以极大的学术活力，创造出一批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其中最为突出和典型的是：（1）“在中国古代社会和思想史研究中，杨（向奎）先生运用唯物史观愈来愈熟练，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②杨先生从 1950 年始，至 1957 年调离山东大学，这八年期间，至少发表了 37 篇与此相关的学术论文，其中 1955 年一年之中，他就在《历史研究》、《文史哲》等刊物上发表了 8 篇论文。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1962 年，他结集出版了上、下两册 70 余万字的《中国古代社会与

^① 《新中国史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载《求是》杂志 1991 年第 8 期。

^② 徐鸿修：《求实创新，博大精深——杨向奎先生治学的开拓进取精神》，载《文史哲》2001 年第 2 期。

古代思想研究》，在这一领域中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学术地位。(2) 童书业“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①。在 50 年代，童先生至少发表了《论“亚细亚生产方法”》、《略论古史分期讨论中理论结合史料问题》、《与苏联专家乌·安约瑟夫维奇商榷中国古史分期等问题》等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方面的文章 20 篇。在这些文章中，他“以其深深植根于传统学养的那种精细、排比、求实的严谨思辨及其清晰的理路去理解马克思主义著作，再与中国及古代东方、西方的历史文献、历史事实结合，尽力得当地、明晰地复原过往的历史”^②。正是由于得益于唯物史观的指导，使他不但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上独树一帜，而且在春秋战国史、中国手工业史和绘画史的研究中，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虽然他当时的某些研究不可避免地带有 50 年代教条主义的痕迹，但由于他是抱着“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发展着”^③的原则来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再加上他在史料方面的丰厚基础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因而其研究成果“新意纷陈，今天看来，仍旧是具有生命力的”^④。在有关春秋史和《春秋》、《左传》的研究方面，童先生所达到的学术高度，迄今仍难有人超越。(3) 由上述一系列研究而引发的关于中国社会形态分期问题的学术大讨论。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交替的理论，成为讨论中国奴隶社会何时结束、中国封建社会何时开始、资本主义何时在中国萌芽等问题的理论指导，而在同一理论指导下的学术结论则又“百花齐放”。其时，童书业先生主张古代东方封建早

① 徐鸿修：《求实创新，博大精深——杨向奎先生治学的开拓进取精神》，载《文史哲》2001 年第 2 期。

② 《童书业历史理论论集·序二》，青岛出版社 1998 年版。

③ 童书业《论“亚细亚生产方法”》是“建国后第一篇专门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文章”（林甘泉语）。在这篇文章的开头，童先生就指出“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是发展着的”（载《文史哲》1951 年第 4 期）。

④ 《童书业历史理论论集·序二》，青岛出版社 1998 年版。

熟论，杨向奎先生倡导西周封建论，吴大琨先生则力主战国封建说，王仲荦更以魏晋封建说而独树一帜。《文史哲》于1956年曾连续三期刊发王先生《关于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及封建关系的形成问题》一文，在这一长篇论文中，王先生将唯物史观与魏晋史的研究相结合，系统全面地提出并论证了著名的“魏晋封建论”。同年，《人民日报》又以一个整版的篇幅，介绍了他和尚钺先生魏晋封建论的观点。这也把他的魏晋隋唐史的研究推到了当时的学术前沿，我院也因此而成为学术界所公认的魏晋隋唐史的研究基地之一。（4）赵俪生先生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史和中国土地制度史的研究。赵先生早在三四十年代就研读过马列的经典著作。1952年他在《文史哲》上发表了《马克思怎样分析法国第二共和国的历史》，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1953年下半年，他选定“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作为教学和研究的重点，一年间不仅为本科生开设了“中国农民战争史”这门大受欢迎的课程，而且发表了13篇有关农民战争史的论文，后辑为《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文集》出版。山东大学历史系也因此而成为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的学术重镇。除此之外，张维华先生的中外关系史和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郑鹤声先生的中国史学史、中西交通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黄云眉先生的明史研究，吴大琨先生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华山先生的宋史研究和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韩连琪先生的秦汉史研究，孙思白先生的民国史研究等等，均曾在学术界产生过重要影响。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创造了山东大学历史系五六十年代的辉煌，并为山东大学赢得了“文史见长”的盛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山大历史系任教的许思园先生则是一名精通外文、学贯中西的重要学者。30年代，他以英文发表的若干学术文章即为海内外学术名家如清华大学教授吴宓、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所称道。1951年他到山大历史系任教，此后十几年中，他集中撰写了关于中西哲学史和中国诗论方面的十数篇论作。但令